借帆出海：《丹·布朗现象诠释》的文化输出之旅

蓝云春 吴阿敏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1），120–124 页

内容摘要：在“文化贸易逆差”令人堪忧的情形下，外国文学研究可以“借帆出海”的方式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英文学术著作《丹·布朗现象诠释》从中国视角研究举世瞩目的文化悬疑小说家丹·布朗，著者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文学、文化观念解读丹·布朗的过程中，自觉、用心地将中国元素不着斧痕地融入其中。该书的学术本土化视角、全球写作策略和发行模式、以及著者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成竹于胸的文化、学术自信为通过外国文学研究推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典型范例。

关键词：丹·布朗《丹·布朗现象诠释》文化“走出去”外国文学研究 本土意识

WATERMARK

随着日益富强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早已成为政府、媒体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热点。通过“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向世界推介全新的中国形象以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那些“健康的、有孕育性和前瞻性”的文化精髓，汇入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海洋中，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忧虑甚或焦虑的事情”[1]。学界主要从文学译介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问题以及策略。事实上，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同样可以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领域，但遗憾的是，从该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尚未引起评论界的足够关注。本文通过分析英文学术著作*Dan Brown Craze*（《丹·布朗现象诠释》，以下简称《诠释》）中的“借帆出海”策略，说明从本土视角出发，自觉运用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外国文学的可行性和价值，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文献回顾：探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领导人迫切希望以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为载体，向世界呈现新生的共和国形象。从1951年开始的《中国文学》期刊（英法版），到20世界八九十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主持的《熊猫丛书》，再到21世纪国家推出的中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高度重视和满腔热忱。

学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讨论已进入总结、回顾和反思阶段。鉴于文学译介是“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2]，学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烈讨论主要发生在文学和翻译领域。著名翻译家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助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但“收效甚微”。[3]有例为证，《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均于2000年黯然收场，规模浩大的《大中华文库》也只有个别选题被国外出版社相中。甚

1 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上海采风》，2010年第3期，第19页。
2 高飞、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49页。
3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2页。

正文.indd 120 17-12-14 下午4:49

至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英译版《红楼梦》，虽然在国内备受赞誉，到了英语世界却也遭遇被冷落的命运。

中国文化为何没有如预期般有效“传出去”？据此，学界进一步探究了如何让中国文化“不光是走出去，还能走进去和融进去”[1]，主要聚焦于谁来译、译什么、如何译、谁出版等问题[2]。诚如学者们所言，在“西方尚未形成对外来文化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下”[3]，中国文化的“逆势”输出切忌“贪大求全”[4]；在有如恋爱关系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更不可“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5]。需在充分认识困难和障碍的基础上，遵循文化传播规律、积极努力地寻求化解手段、讲策略、求实效地逐步推进。

文学翻译界的“借帆出海”是媒体对史志康教授翻译《论语》的称颂。史教授在译出每一段孔子语录后都“广征博引西方前贤名哲的经典语录和事迹”[6]，使得“两相辉映，相得益彰”，被认为是“从翻译实践上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7]。借此，译者拉近了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名家思想的距离，有助于在西方“培养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良好的接受环境”[8]。鉴于西方读者对本土以外的文学作品总是持“傲慢与偏见”态度，“借帆出海”的迂回策略颇值借鉴。

二、与世界接轨的外国文学研究：开拓中国学术、文化不胫而走的新航道

学者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策略做出的有益探讨，同样适用于通过外国文学研究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外国文学研究本土意识缺乏、在国际学界基本失语的情形下，中美学者联手推出的《诠释》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体现在该著作中的中国视角、本土意识为中华文化远播海外开辟了新航道，可成为以“借帆出海”策略推介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典范。选题切入点巧妙，中美知名学者合作撰写，并且由海外优质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优势则为该书“借帆出海”的“文化输出”之航打造了坚实“船体”。

首先，《诠释》从中国视角出发，对举世闻名的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系列文化悬疑小说进行了解读。中国声音、中国学者迥异于西方评论的见解是该选题的新颖之处。

自2003年《达·芬奇密码》面试以来，丹·布朗已成为誉满全球的作家。他的作品已被译为14国文字；两亿册书的出版量，连美国诺贝尔奖作家托里·莫里森也只能望其项背。《达·芬奇密码》问世造成的“达·芬奇现象”[9]和“丹·布朗热潮”经久不息[10]。其创作引起的轰动和论争实属罕见。在纸质阅读备受冷落的数字时代，布朗的出现让读者重拾书本，在体验阅读愉悦的同时引发深思、启发心智。在美国，布朗创造的文学神话使他一夜爆红的同时成为众矢之的。对宗教和《圣经》的颠覆性解读让他背负“阴谋家”等诸多骂名。仅在《达·芬奇》密码面世后不久，评论界已出版数十部书籍驳斥他对宗教的“亵渎”。[11]

丹·布朗在中国的成功之旅却是一帆风顺的。西方世界的宗教情绪对于中国人相对陌生。自2004年朱振武教授主译的《达·芬奇密码》登陆中国以来，读者们乐于沉浸在布朗那知识加悬疑的世界里尽情汲取西方历史、文化、宗教等知识的养分，“在如沐春风中博文强识”[12]的同时对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进行思考。

1 朱振武、杨世祥，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误读和重构，《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第77页。
2 谢天振，换个视角看翻译——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第4-8页。
3 同上，第4页。
4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9页。
5 高飞、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53页。
6 史志康，借帆出海——史译论语选载之一，《东方翻译》，2012年第2期，第66页。
7 同上，第66页。
8 谢天振，换个视角看翻译——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第6页。
9 Zhu Zhenwu, Zhang Aiping, *Dan Brown Craz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 1.
10 Ibid, p. 4.
11 朱振武，《解密丹·布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2 同上，第177页。

正文.indd 121　17-12-14 下午4:49

除了普通读者，丹·布朗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的高度关注从以下数据中可见一斑：截止2014年，有110篇文章、47篇硕博论文、两本专著论及布朗。[1] 普通读者和学术界齐聚焦，这是布朗在中国创造的诸多效应之一。布朗在中国引发的唯一论争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界，学界认为布朗的创作打破了两者的界限，是雅俗合流的成功典范。[2]

由此可见，受历史、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视角的丹·布朗解读迥异于美国，在世界丹·布朗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诠释》借鉴古今中外文学观念对布朗的六部小说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介绍和分析了每部小说的情节、人物、背景、主题、密码、知识、机构、创作技巧等，集学术著作、旅游手册和知识库于一身，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以及在世界学界建立当代中国学术立场的识见。通过此书，西方读者可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文学研究、翻译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让世界了解“快速发展、拥有成百上千万的英语学习者和对西方文学感兴趣的人”[3] 的中国意义重大。乘着莫言获诺奖的东风，中国作家正努力向世界呈现中国文学。在海外世界也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兴趣渐浓的情形下，该书旨在“为促进两者之间真诚而有意义的交流做出贡献。”[4]

除了好选题，合适的作者至关重要。《诠释》的中外知名学者合作以及海外知名出版社出版的发行模式值得信赖和推广。该书的第一著者是作家朱振武教授。朱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研究，且中国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作为丹·布朗“钦定”的简体中文翻译家、其目前所有文化悬疑小说的中文主译者及其作品的研究专家，朱教授的撰写保证了该书的高品质。

著名翻译家们普遍认为，国外汉学家翻译，或者参与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度更高，因为他们“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的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趣味”有更好的把握。[5] 因此，中译外应避免“中国人译外文给外国人看，往往吃力不讨好”的局面。[6] 用英文写作的文学研究专著亦如此。深谙此理，《诠释》诚邀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文学教授张爱平先生合著，保证了该书在西方英语世界的易接受性。张教授自1984年开始在美国学习、工作，是拥有中美双重身份的知名学者。他不仅熟悉英语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兴趣，而且了解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认为“对实际读者的阅读及审美要求重视不足”属决策性失误。[7] 张教授的加盟可避免此类错误，有助于该书在目标读者中的有效流通和接受。两位中美知名学者携手经三年努力精心打造的《诠释》具有里程碑意义，将推动布朗研究的新高度。

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系统工程中，熟悉“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式”、“进入对方的传播体制”亦非常关键。[8] 剑桥学人出版社的倾情出品使《诠释》顺利进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该出版社通过推出高品质的专业学术著作，致力于传播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研究成果。《诠释》的中国视角、全球写作策略对该出版社具有强烈吸引力。其尊重著者，注重图书营销的好声誉同样吸引优秀学者：通过准确的市场定位充分挖掘、发挥学术著作价值，善于通过发表书评推销图书，而且旗下80%的书籍瞄准的是英国以外的市场。在与该出版社精诚合作的过程中，两位作者也以宽广的胸怀做出了让步，将该书的电子版权同步授权，为加强我国学者与国外出版社合作、促进中国学术“借帆出海”起到示范作用。

1 Zhu Zhenwu, Zhang Aiping, *Dan Brown Craz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 10.
2 朱振武、周元晓，《达·芬奇密码》：雅俗合流的成功范例，《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109页。
3 Zhu Zhenwu, Zhang Aiping, *Dan Brown Craz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 19.
4 Ibid, p.19.
5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3页。
6 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上海采风》，2010年第3期，第21页。
7 包相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困境及策略，《中国出版》，2015年第16期，第41页。
8 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上海采风》，2010年第3期，第17页。

正文.indd 122 17-12-14 下午4:49

三、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本土化：借帆出海、踽踽前行

中国学术界拥有庞大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但基本状况是学者们花了巨大努力研究西方文化、文学，却并不为外人所知，在国际学界基本处于失声状态。而且，“文化贸易逆差”令人堪忧，外国文学研究却仍处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境地。国人做学问“一心只为西”、“国学无点墨”的情形亟待纠正。[1]《诠释》是朱振武教授本人注重学术本土化和学术自觉的最佳注脚，也是他为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身体力行的良好例证，为增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本土化意识带来启示。

据统计，《诠释》中对中国文学、文化观念、人物、技巧等的引用达60余处。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著者对这些中国元素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或注解；为了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李渔、金圣叹、李汝珍等知名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每次提及时，著者都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他们的身份。《诠释》中的中国文学、文化观点引用比起朱教授2010年推出的《解密丹·布朗》中的30余处多出了近一倍。这充分说明了著者的学术本土化意识愈来愈强烈，在与西方学界直接对话时尤其具备学术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研究举世瞩目的美国作家“借帆出海”，著者用心良苦地将中国文学、文化观念以巧妙的形式融入其中，顺势助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如珍珠般散落在《诠释》中的中国文学、文化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用中国文学名著的创作手法佐证丹·布朗创作的非凡功力；借中国历史、文论、美学思想等探析丹·布朗小说的玄妙世界。

首先，在分析丹、布朗的创作手法时，著者将中国文学名著的创作手法与之进行了比较，涉及到的中国文学名著包括《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等。例如，该书将《聊斋志异》历久弥新的吸引力和《达·芬奇密码》的一鸣惊人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的成功均归功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以及作品的雅俗共赏[2]；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天使与魔鬼》中的教皇和维特拉两个相似人物的设置，以《水浒传》中“犯中见避”的人物塑造方法为例，说明同中见异是突出人物个性最佳途径之一[3]；以《红楼梦》中独属于王熙凤的“未见其人，先闻其身”的出场方式为例，分析《数字城堡》中远程友加甫才出场已是弥留之际的悬念效果，认为布朗深谙“出场各别，均极用意”的道理。[4]

除了用心拉近丹·布朗与中国文学名著之间的距离，《诠释》还不着斧痕地自觉运用中国历史、文论和美学思想阐释丹·布朗创作。刘邦对张良的誉美之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被用来称颂布朗：他在小说布局和结构设计方面的精湛技艺犹如善于排兵布阵的杰出军事家[5]；在论及《骗局》的引人入胜时，则结合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的“编戏如缝衣”理论，说明紧密安排行文结构的重要性[6]；“横云断岭、横桥锁溪”，“寒冰破热、凉风扫尘”是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情节结构传神、巧妙的高度概括，《诠释》著者借此酣畅淋漓地点评了《天使与魔鬼》的六条情节线索，分析了该小说张弛有度、井然有序的设置缘何带来奇妙的阅读体验。[7]

在引用古今中外的文学、美学观念和范例解读丹·布朗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文化元素的出现自然、和谐地汇入行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大熔炉”并置；阿Q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同行；屈原与《神曲》作者但丁同台备受后世赞誉；李汝珍的博学多才足以媲美

1 朱振武，外国文学研究的跨界思考，“《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的跨界研究研讨会”发言内容，2016-6-15。
2 Zhu Zhenwu, Zhang Aiping, *Dan Brown Craze*,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 210.
3 Ibid, p. 107.
4 Ibid, p. 63.
5 Ibid, p. 268.
6 Ibid, p. 206.
7 Ibid, p. 155.

正文.indd 123　17-12-14 下午4:49

《白鲸》作者赫尔曼·麦尔维尔。此类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体现了著者的煞费苦心以及他们学贯中西、道通古今的功力，同时也彰显了中西文化间的共性，为搭建文化交流之桥凭添了基石。

在一部近四百页的著作中，这些中国文化元素也许尚够不上可观，却无疑是“对外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谋定而动、突出重围”[1]的深谋远虑。文化交流有其自身规律，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2]目前，拥有强势文化的西方，对中国“弱势”文化的“拿来”意愿并不强烈。[3]鉴于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建设自己、壮大自己，吸引人家主动来拿”[4]；另一发面，为了培育西方读者逐步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我们需在不断努力中渐进。遵循文化交流规律，不“贪大求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逆流而上、踽踽前行的航途中，《诠释》呈现的是与西方读者真诚、从容交流的耐心和细致。另外，相比于“居高临下的空降”，陆谷孙先生主张我们的文化输出不如“放低身段融入”。[5]《诠释》中的中西文化沟通则是更为可取的，以亲和、友善的姿态进行的平等对话，尤为可贵。《诠释》的“借帆出海”，让中国文化登上了外国文学研究这艘巨轮。《诠释》的中国视角带来的是双赢局面，既吸引了人家来“拿”，也顺势成功地将我们的文化“送”了过去。

结语

外国文学研究是以“借帆出海”方式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领域。用英语写作、从中国视角出发的《诠释》为中国的学术、文化走出去带来诸多启迪。《诠释》让中国学者的声音融入到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大合唱中，成为其中的重要声部，体现了中国视角的独特价值。正如朱振武[6]教授在《我们需要诗意地栖居》报告中所言：“这部书不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足以为外人道也’的书，是直接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远航中，《诠释》启示更多的外国文学研究学者能够以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的学术本土意识以及成竹在胸的文化自信，一步步引领中国文化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 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上海采风》，2010年第3期，第18页。
2 谢天振，换个视角看翻译——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第8页。
3 同上，第6页。
4 高飞、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52页。
5 赵芸、袁莉，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上海采风》，2010年第3期，第18页。
6 朱振武，我们需要诗意地栖居，“《丹·布朗现象诠释》发布会暨丹·布朗小说在中国研讨会”发言内容，2016-6-19。

正文.indd 124 17-12-14 下午4:49